

Saints and Graffiti
Travels Through Heterotopia

异托邦

涂鸦与圣像

异托邦城市简史

韩博 著

出版联合集团
北京出版社

Saints and Graffiti
Travels Through Heterotopia



涂鸦与圣像

异托邦城市简史

韩博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 / 韩博著.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339-4936-5

I. ①涂… II. ①韩… III. ①城市-艺术-研究-世界 IV. ①J1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860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曹元勇 王 青

特约编辑：余 音

封面设计：朱云雁

责任印制：吴春娟

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

韩博 著

出版发行：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20mm×1300mm 1/32

字数：170千字

印张：8.75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39-4936-5

定价：5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001 | 做自己的事

005 | 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意外生存

043 | 撒娇呢，严肃点！

079 | 柏林长墙下：苍穹与意志

127 | 游逛者的惊颤

175 | 拯救爱，及其工具

213 | 去导弹休克症

243 | 布宜诺斯艾利斯制造



做自己的事

韩博

哥本哈根的一个街角，某人遇见一位朋友，邀其餐叙。他热情应允，却被一片落瓦击中，应声而逝。

这是索伦·克尔恺郭尔(Søren Kierkegaard)讲述过的一个故事。

我也有类似的故事，而且是两个：1997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崔江宁——当时他还是复旦的本科生，燕园剧社的灵魂人物——准备去北大参加研究生面试，结果一头栽倒在校门口的公交车站，再也没能起来；2004年，曾经将燕园剧社的图章交予崔江宁的马骅，即将离开云南与西藏交界地带的德钦，打算返回大城市，寻一所高校，继续读书——硕士或是博士，他寄希望于免试——结果落入澜沧江水，终未复还。

马骅前往云南之前，曾经“欺骗”朋友们，说他要“周游世界”。“世界”是什么意思，云南、海南还是越南？也许他作出了回答，那不是欺骗，世界即自己，“周游世界”不过就是“做自己的事”——混迹北京的那几年，他厌倦了那些夸夸其谈地要拯救世界却又永远停留于唇舌之间的人，厌倦了他们在讲台上或酒桌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地内裤外穿。

虚无近在咫尺，多数人并无警觉。这是克尔恺郭尔对于世人的提醒。任何一个偶然的瞬间，都有可能成为哥本哈根的街角。是时候了，

上帝的分配并不丰裕，没有生命可以浪费于鸡零狗碎之中。

这本题为《涂鸦与圣像：异托邦城市简史》的书中，收录了我为七个国家写下的旅行笔记：丹麦、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塞尔维亚和阿根廷。从欧洲到美洲，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它们是我以十五年的生命经验换取之“世界”的一部分。我很想看看，他者之中，更多的人如何“做自己的事”。

我是在暴力塑造的20世纪睁开眼睛的。尽管那只是一个尾声，但暴力所维系的关于乌托邦的话语仍在延续。我乐于前往那些并不信任乌托邦在场的城市——尽管每一座城市的历史上，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僭越释放的恐惧与自我反讽的闹剧——没有一座城市是20世纪的孤岛。然而，总有一些这样的个人：他们不做“无意义的工作”。个人自由的行使基于对存在本质的思考。某些时刻，他们自发建造异托邦，使其具有想象与真实的双重属性，成为既存环境的校正之物。

在这样一场漫长的旅行中，我抵达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克尔恺郭尔的故乡。2002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时差发作，我难以入睡，便拎着相机四处转悠。哥本哈根就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而河边的涂鸦则令我感到难以名状的震动。虽然那只是再简单不过的泡泡字体图案，但对于我，对于一个已经习惯了墙壁的沉默和唯一获准在墙壁上公开发声的钢筋铁骨一般置人于集体之中的口号的人来说，那无疑是一道敞开的门，通往一个轻蔑的微笑。只是，当时的我并不明白，已经近乎完美的现实之中，为何还会存有轻蔑的微笑。那一年，我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亚无政府主义公社的合法存在。

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涂鸦艺术成为了我观察城市文化的一种入口，尽管它远非体验的终点。涂鸦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堪称“正统”世界之中的差异性存在。它们不断将社会材料转化为亚文化表述，不断提出新的质疑，并因此针对真真假假的“圣像”而擅自修改“正统”世界的外形。涂鸦是无能的表现吗？如果涂鸦无能，圣像亦无能——从古典世界至今，每一尊圣像在成其为圣像之前，不都是某种形式的涂鸦吗？反主流文化的暗号或咒语，新生符号的游击战，甚至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不亚于一场超现实主义的战争。

然而，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涂鸦的工具书。涂鸦艺术是我行走之时的旅伴，我们一起前去探访那些彼此交战的圣像——一个口臭一个脚臭的异托邦，以及“戈多今天不来了”的乌托邦。我真正关心的，是在涂鸦覆盖的社会剧场之中，那些绝非偶然出现的观众。而那些观众，正是克尔恺郭尔所揭示的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我总是希望在未知的旅途中，邂逅一位又一位自由之人，他们本身即异托邦城市简史。

本书的最终完成，离不开诸多友人的热情相助，在此一并致谢。我的前任老板许敏和素素为我的多次采访之旅提供了策划和支持。著名的旅行编辑方园女士帮助我策划并落实了前往阿根廷的行程。阿根廷驻上海总领事馆的Javier De Cicco先生与吴娴敏女士不仅提供签证支持，更赠送大量文学与旅行资料。塞尔维亚旅游局的李蔚女士与Aneta Uskoković女士帮助我实现了巴尔干半岛之旅。我的多次英国之行也离不开英国旅游局钱岗先生与马倩倩女士、英国维珍航空公司邱婷婷女士与傅霜露女士、朗廷集团孙炎女士的支持。此外，更要感谢浙江文艺

出版社曹元勇先生的出版策划，以及胡远行先生与朱云雁女士的具体建议。辛晓钟先生则再度从我崩溃的电脑中挽救出了书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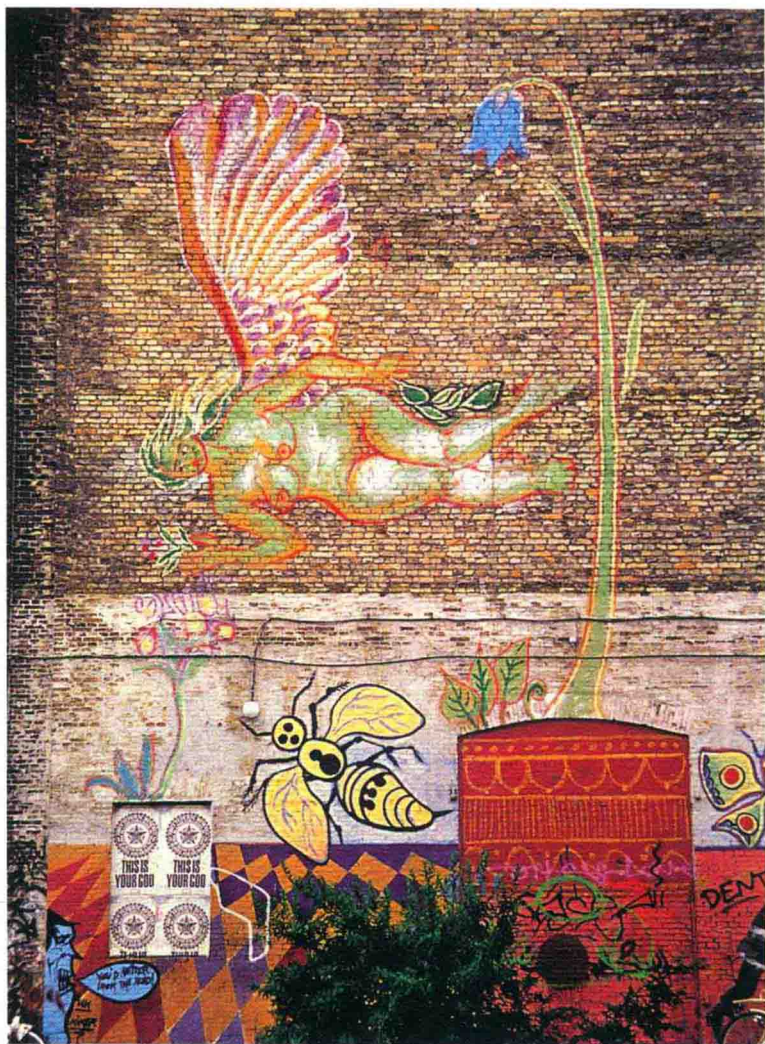
格外值得铭记的，却是那些旅途中的短暂同行者。也许永别，我们的异托邦并不过多重叠，但记忆永在。

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意外生存









黄昏时分，余晖以一种暧昧不明的方式，越过树丛，将一片湖泊以及对岸的草地染上一层喜悦与安详的金黄。我们的视线，落在岸边，照片逆光拍摄，我们，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身处夕阳对面，草地才是近景，树丛只是远景。画面上，一群男女坐在左侧，桌边，衣冠楚楚，桌上铺着台布，有烛台，有瓷器，一位女人甚至还守着一枝阳伞，夕晖为她镀上一层审慎的光亮，仿佛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而画面右侧，另外两位女人却在重返伊甸园，近处一位，赤裸着起舞，金发披拂，像一顶帽子；她的身后，稍远处，另一位同样不着一物，垂头、躬身，金发如瀑布直下，献祭般沉溺于自己的舞步……

我似乎从画面上拣到一些词：神游、田园诗、遁世、群居、爱、此时此地、和平、自我、内心生活……我甚至还听到一种音乐：画面中央，乐谱支架语焉不详地空空荡荡，近处，一个男人背转身去，远处，另一个男人举起胳膊，似乎正在指挥一切。

这是唱片的封底。而在封面上，两个孩子，一个以帽子遮脸，一个怀抱萨克斯。他们脚下，一条道路晦暗不明，他们头顶，一行大字白底黑框：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

克里斯蒂安尼亚，地名，位于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港区，占地34公顷，因为全球最后一个嬉皮公社，或者，更确切地说，最后一个无政府主义公社的长期盘踞而著称于世。公社拥有自治委员会，自称此地为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Fristaden Christiania），拒不承认这一块小王子的星球似的领土从属于欧洲联盟，尽管丹麦早已于1973年加入欧洲各大共同体。主入口处，两根世界主义的图腾柱上方横出一块牌子，正面写出“克里斯蒂安尼亚”字样，欢迎非自由城居民自由进入；背面却是“你即将进入欧洲联盟境内”，提示离开者：这是一道不折不扣的边境，尽管并没有浑身刺青的海关人员检查你的申根签证。自由城曾在1997年独立发行社区硬币，称为吕恩（Løn）。每一吕恩的价值相当于50丹麦克朗或8美元。铸在吕恩表面的图案：自由城迎风舒卷的旗帜，以及一只蜗牛——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勤勉精神的对立之物，拒绝“根据神的召唤，努力工作”。克里斯蒂安尼亚并不广阔的边境之内，黄色三圆点统摄的红底长条形旗帜之下，自由城还拥有独立的信息传播机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社区居民并不理睬丹麦政府的大麻禁令，更不用提那些关于室内禁止吸烟之类在他们看来过于婆婆妈妈的清规戒律。自由城的主干道普舍尔大街，堪称全球大麻市场

中的华尔街：40多家店铺全天候营业，非处方大麻品牌近40种，来自于印度、阿富汗、尼泊尔、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家，据称这一并非由社区居民操纵的生意，年销售额可达1.5亿美元，这还是前些年的数据。

2004年夏末，我曾多次越过“欧洲联盟边境”，涉足那座城中之城——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罗网之中极为罕见的一块飞地。我在普舍尔大街的一处非主流产品摊位，以不菲的价格收购了上述封套里的唱片——“索尼音乐”于2001年出品的公社同名音乐合辑。

克里斯蒂安尼亚的“自由”历史源于1971年，时值大西洋两岸的嬉皮运动如花怒放的岁月。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最初的忤逆，天真且可爱的造反者们初步掌握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武器，明白了不仅要攻击资本主义制度，更要攻击资本主义的权力源头：法律、权威以及国家。忤逆的形式，亦从早期“想象即革命”式玩世不恭与沉思冥想，转变为将“做自己的事”与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大拒绝”思想相融合，反对一切出卖身体与自由以换取工资的“无意义工作”的行动，拒绝因袭“缺乏否定、批判和想象能力”的“单向度的人”的生命轨迹。他们开始占领一些“过剩的”建筑物，在大城市缝隙间设立群居据点，以期创造出替代现存制度的生活环境。

自由城的基址，虽然被称作港区，却距离哥本哈根心脏地带——丹麦议会——仅一英里之遥。议会所在的建筑，属于哥本哈根

市内最古老的宫堡——克里斯蒂安堡。该堡曾为丹麦国王的宫殿，以其为核心的区域，正是这座北欧都会的发源之地。建于17世纪前半叶的欧洲最古老的证券交易中心也在议会左近——它可以被视作嬉皮士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早期蒸汽机——砖红色的立面与铜绿色的屋顶之上，四条龙尾相与缠绕、盘旋而上，上有三顶皇冠，分别代表丹麦、瑞典和挪威，合为象征北部海洋霸主的尖塔一尊。

我第一次造访哥本哈根，是在2002年。当时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存在，却对议会充满兴趣，因为它的大门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敞开的。这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的空间体现。我可以旁若无人地长驱而入，直至花园与图书馆，直至图书馆前的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恺郭尔的雕像。这位一生从未谋求任何职业、仅靠遗产生活、专事宗教哲学著述的哥本哈根之子，堪称不做“无意义的工作”之先驱。虽然他只专注于“做自己的事”，却使得欧洲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方向性的转折——哲学研究的对象可以不再是抽象的客观存在，而是具体的个人存在，亦即孤独的、非理性的活生生的“存在”，由激情、决定和行动组成，其中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够被思维所穷尽，却注定被经历。克尔恺郭尔并不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但认为它们与个体的生存漠不相关，而主观真理却对存在者至关重要，比如伦理观点与宗教评价。然而，克尔恺郭尔又认为主观真理不能被言说，因为即便被说出，也无法直接被理解，而是只能经由暗示、影射、夸大、淡化、谎报、取笑、诗化甚至忽视进行间接传达。他认为黑格尔导致了整整一代人思想生活的非人性

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它自身的对立面，取消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否定了自由——人类生存的本质。克尔恺郭尔“做自己的事”的目的，并不是发展全新的认识论，也不是创建全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希望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类——能够把握自己的自由，并且创造自己的命运。由是观之，克里斯蒂安尼亚自由城的思想源头，似乎就在这一英里之外，尽管某些居民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克尔恺郭尔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人在哥本哈根街角遇见了一位朋友，朋友邀请他去吃饭。他热情应允，却被一片落瓦砸死。克尔恺郭尔意在提醒世人：虚无近在咫尺，大多数人却并无警觉，而是一任生命浪费于鸡零狗碎之中。我前往哥本哈根，自然是为了鸡零狗碎之事，甚至根本就是一桩出卖身体与自由以换取薪酬的“无意义工作”。不过，将我第一次引至克尔恺郭尔像前之人，是一位刻意避免成为“单向度的人”之践行者。他生于中国，一度辗转于缅甸、泰国和老挝，当时定居于丹麦。短短十几年内，他的人生角色迁徙于数学教师、诗人、沙弥、难民、留学生、小说家和哲学研究者之间，貌似风马牛不相及，却不过是把握自由、创造命运的结果。在他的半生之中，还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成功阻挠他前往任何的别处。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刚到丹麦的时候，由沙弥而还俗，从事清洁工作，但被一次意外车祸带来的赔偿送入大学校园。当他决心以哲学为专业的时候，校方却诚恳建议这位曾经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数学系的亚洲人重读数学。为了获取自由选择资格，